

贵州少数民族经济研究

第4集

贵州省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 编

贵州省少数民族经济研究

第 4 集

目 录

- 代序言 国家民委副主任赵延年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
会上的讲话…………… (1)

农 业 研 究

- 贵州民族地区经济的出路在于发展生态农业
……………杨传柱 (8)
- 民族地区农业科技队伍的建设要跟上商品经济
发展的需要……………陈绍铨 (18)
- 黔东南的山地价值及其经济发展对策……………杨广贤 (26)
- 建立清水江民族经济区的建议……………邹黔柱 (34)
- 对我省少数民族地区林业改革的初步探讨…李子祥 (42)
- 浅谈少、边、穷山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
……………陈佑金 (51)
- 我省民族地区农业生产中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黄家逊 (61)

私营经济研究

- 少数民族地区要重视私营经济的发展……………龙国辉 (69)

价格政策探讨

- 贫困地区肉食品供求弹性及价格政策探讨

……………张尤森 (77)

边沿地区经济研究

- 加强边界市场的建设与管理是发展西部地区农村商品经济的客观选择……………潘 波 (98)

人 才 开 发

- 浅析民族地区经济管理干部的现状及时解决存在问题的对策
……………吴世华 (114)

- 论贵州民族地区经济待开发阶段教育超前发展问题

……………黄保勤 (123)

- 民族地区乡镇企业人才来源探觅…杨剑平…裴重喜 (135)

发展与研究

- 发展外向型经济与贵州民族地区的对策……牟代居(144)
- 落后的传统观念对贵州民族经济的影响……金安江(156)
- 黔南州适应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浅见……刘仲森(169)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省民族地区经济开发研究
..... 吴支贤(179)
- 浅谈我省民族地区在治理经济环境中的选择
..... 黄恺新(189)

民族财政研究

- 用好民族资金 报兴民族经济……石阡县财政局(198)

资源开发

- 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设……李湊道(205)

扶贫工作研究

- 民族乡治穷致富工作的几个问题……廖朝隆(213)
- 剑河县少数民族山区林业生产的调查报告…欧胜吉(222)
- 望谟县纳夜乡脱贫致富探讨……黄学富(238)

- 关于建立贫困特区设想和探讨
.....贵州省城乡抽样调查队综合处(244)
- 利用本地资源走向脱贫致富.....王灿元(250)
- 关于贫困地区救灾扶贫工作的探讨.....杨绍益(255)

单一民族经济探讨

- 近代以来贵州苗族经济的发展.....龙国辉 吴国才(267)
- 谈消费习惯的民族特点.....史顺章(302)

试验区与优惠政策

- 建立锦屏林业改革试验区探讨.....单洪根(312)
- 黔南州制定发展林业的八条措施.....(323)
- 玉屏——黔东经济开放、开发试验区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人才资金.....(325)

资 料 介 绍

-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要理论问题的观点简介.....(328)
- 关于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特点和税收面临的问题.....(335)
- “穷汉们”不再沉默决心做开发西部主人.....(346)
- 我国经济发展十大趋势.....(349)

- 太平洋经济时代.....(350)
- 亚洲四小龙——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的
经济情况.....(351)

论 坛 纵 横

- 改革十年来的民族工作.....张北平(357)
- 编后语.....(367)

国家民委副主任 赵廷年同志在中国少数民族 经济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我先后四次参加了全国性的少数民族经济讨论会，每次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对我本人的思想提高和进一步了解下面情况都有很大帮助。我看了一些本次会议提交上来的论文，觉得我们的学会很有希望，同志们研究问题不但与实际结合起来，而且有了比较浓的理论色彩。过去有些论文与调查报告没有什么区别，缺乏理论抽象，而现在已经有了不少的进步，特别是培养出了一批中青年人才，很使人高兴。在经济学领域里，需要多层次、多方面的研究人才。有了现在这样的基础，我相信这次年会和下届学会的工作会比过去更好。下面我讲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它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农村经验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这个决定小平同志称之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经过十年改革，特别是近五年的全面改革，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大家知道，我们过去的改革，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的，不管是承包、放权让利、两权分离，还是多种经营方

式，都是围绕着一个重点：即提高人的积极性。由于积极性提高了，人还是这些人，地方还是这些地方，企业还是这个企业，释放出来的能量就大不相同。这才有了我们这几年的高速发展，有了现在这种建设规模，有了现在城乡面貌的变化。改革的根本目的最后都要落到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阶段。经济体制改革是要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建设民主政治，提高人的素质，从而保证和促进商品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发展。二者是互为作用的。过去，我们几十年搞的都是产品经济，或者用现在理论界的话来说叫作“分配型或调拨型的产品经济”。价格是严重扭曲的。许多产业之间、企业之间和许多产品之间，由于价格的不合理，体现不出真正的价值和效益，不利于充分调动积极性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所以，进一步深化改革，价格这一关是非过不可的。也就是说，要使价值规律起作用，使市场的功能发挥出来。

改革价格体系难度很大，工作量很大。我们这几年做了许多尝试和探索，“双轨制”就是这种探索。既要保持稳定，又要保持一定的速度，还要理顺不合理的关系，其复杂性和艰巨性就可想而知了。不改不行，操之过急又会出大问题；积极性不发挥不行，积极性发挥了，没有自我约束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也会出大问题。正是在这样一个深化改革关键时刻，或者说改革正处于爬坡时期，我们召开了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是深化改革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也是深化改革的组成部分与重要内容。改革是要朝

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推进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事业，而不是朝着别的目标。所以，治理、整顿就是要把不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需要的，甚至阻碍和破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东西整顿掉。价格、工资和劳动制度等要改革，但有些具体措施可能暂时要推迟出台。就是说，要有一个好的条件和环境，不然的话，强行出台，会给一些违法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造成可乘之机，会把价格改革搞乱搞坏。有些国家的改革受挫甚至失败，就是这一关没过好，没有把稳定、速度、改革结合好，没有控制住通货膨胀。本来价格的结构改革不是通货膨胀，可是，如果经济过热，不在宏观上加以调控，一些人在中间一“倒”，它就搞成了通货膨胀。我们原来的约束机制，对越来越多的计划外资金和建设已经失去了控制力；新的约束机制还没形成，大家都想上得快，既缺乏宏观的调控，又没有自我约束，这就形成了“过热”和“膨胀”。所以，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深化改革的方针；并确定在近二年内把重点放在治理整顿上。这是个积极方针，是为了更好的改革，使改革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

第三个问题，十三届三中全会决策的必然性。

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中央为什么要采取这个决策？而不是别的决策？为什么要开出这剂药方而不别的药方？别的药方存在不存在？它是存在的。

一个药方是走回去，我们搞了几十年统购统销，统购包销，有一套发票凭证控制销售的办法，轻车熟路。过去，我们碰到过严重的困难，甚至可以叫危机时期，比如“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低标准”，物资严重匮乏。那时是隐性

通货膨胀，办法是发票证，有钱买不到东西。现在用不着当时那么多票证就能解决问题，但这个路子不能走，因为它不是搞“活”而是搞“死”，会挫伤人的积极性和损害我们十年改革的成果。

另一个药方是彻底放开不管，谁有本事谁当亿万富翁，谁没有本事谁当穷光蛋。有的干脆认为全面私有化就是了，既不要“社会主义”，也不要“有计划”，就搞商品经济。国外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提出，要搞商品经济，要发挥市场机制，是与公有制基础不相容的。只有全面私有化，才能使商品经济大发展，市场功能才能充分发挥。也就是说，要搞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对于受尽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之苦的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教，当然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只能沿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把不利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环境治理好，把秩序整顿好，把改革不断引向深入。

我们搞实践工作的同志，要有理论依据；而我们搞理论研究的同志，要为实践做决策的前期工作，我们的理论研究不光要解释政策，更要做超前工作，起参谋智囊作用。我们这次会议。不仅要研究治理和整顿，还要研究改革的条件、改革的内容和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在这方面，希望大家发表好的意见。

第三个问题，我希望我们这个学会进一步贯彻对外开放的方针，开拓视野，加强比较研究。

一要研究周边国家的情况。我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边境地区，那里也是我国对外交往的前沿。我国周边国家有

12个，从自然条件到社会条件与我国的部分少数民族有些共同点。我们如果只从本国的情况研究民族问题会有局限性。比如研究东北的民族问题，就应了解苏联东西伯利亚的情况，尤其是民族情况；研究新疆民族问题，就要研究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的情况；研究内蒙古就要研究外蒙古和苏联；研究云南就要研究缅甸、老挝和越南，甚至还可延伸得更远些。总之，对于周边国家，我们应该有所了解，把眼界放宽些，以便作为研究国内民族问题的借鉴，并为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和经济、技术、文化交往服务，各国资源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不仅有竞争，而且还有个互补、互利的问题。如果我们了解了周边国家的情况，就可能有个新的考虑。

■ 二要根据需要研究一些主要国家。就一个地区来说，还可以研究某个国家的某个地区的情况。一般国家都有一个民族问题，那么它的民族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一般国家都有一个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它的落后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在我国这种制度下应该怎么办？总起来说，我们应在广泛借鉴的基础上，制定和完善我们的发展战略，以促进民族经济发展和各民族共同繁荣。

三要在学术上进一步开放。现在西方经济学是学派如林。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中也有不同的侧重点，实际上有的也可以称之为学派，比如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揭示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的通病——投资饥饿症。这种饥饿是和短缺连在一起的，现实中表现为投资饥饿，物资短缺。就我们国内的现实情况来说，有些同志一方面说“资金短缺”，可另一方面又希望基本建设的压缩不要搞“一刀切”。既缺钱，又说有钱不让花，岂不是自相矛盾？再如，不

少地方一方面说“人才奇缺，人才外流”，另一方面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浪费人才的现象不少。这种现象怎么解释？怎么解决？都是摆在我们民族经济工作者面前的任务。因此，我们的理论的工作者要进一步开扩视野，立足本国本地的实际，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引下，对于世界上经济学发展的主要动向给以必要的注意，广泛借鉴，提高自己，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第四个问题，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提点希望。

第一，现在是“七·五”后期，好比是农作物的抽穗、灌浆期。我希望“七·五”课题的研究工作再接再厉，在现有的基础上深化提高。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在继续探索中，我们承担的课题也是在探索中。许多料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我们就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然后预测一下。描绘出事物今后发展的趋势来。希望同志们承担的课题——自选的也好，分配的也好——都能再接再厉，随着实践的发展结出丰硕的果实。特别是有许多同志承担着“七·五”攻关项目，希望同志们回去后能提前的就提前，争取向国庆四十周年献礼。当然不能粗制滥造，要有点深度和高度。我们学会要有个好学风，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践中出理论，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力争起一点促进作用。

第二，请大家考虑一下“八·五”期间主攻什么？特别在体制改革方面。因为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前不久，在研究国家民委的“三定方案”时，国务院给国家民委增加了两条任务，其中的一条就是研究民族地区的体制改革。这个任务非常重要，我认为应该作为我们“八·五”期间的一项重要课题。

第三，今后的研究工作。一方面应加强横的研究。要研究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民族经济问题。要研究民族地区地上与地下资源、生物与非生物资源的合理优化组合问题。因为组合的合理不合理涉及到效益问题。另一方面要加强纵的研究。也就是要围绕着增强市场机制和培育市场，分别对民族地区的农业、工业、牧业、林业和商业（包括边境贸易）进行研究。特别要加强对金融市场，劳务市场、技术市场和商品市场中的生产资料市场等问题的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落后是多面的。要使商品经济有个好的环境，要在微观搞活的基础上导好向，就必须下功夫培育市场。而市场不是空的，它由各种各样的市场构成，合起来才有市场功能。这方面，我们过去比较薄弱，专门搞这方面的人也比较少，少不怕，只要有信心，下功夫就能把民族地区的市场问题研究出个眉目来。我们民族地区，我们的民族经济研究工作者，应为建设“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种新的运动机制而努力奋斗。

贵州民族地区农业经济的出路 在于发展生态农业

杨 传 柱

贵州民族地区1985年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7.06%，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92%，全省800多万贫困人口中，大部分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榕江县处于贫困状态的有15万多人，占全县农业人口数的66.8%，望谟县1984年贫困人口数为18.89万人，占人口总数的86.8%。以上的数据有两方面的含义，即贵州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落后性与紧迫性。那么贵州民族地区农业经济的出路何在呢？我们认为希望的曙光在于发展生态农业。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贵州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状况。众所周知，长期以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为主的传统农业是贵州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这种传统农业虽然也是通过劳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来获取维持生存所需要的食物，但它只注重在耕地尤其是农田捕捉太阳能，生产不出更多的蛋白质和粗脂肪，在人口低密度，人均耕地充裕的情况下，尚可勉强维持人们温饱型的低水平生活。随着贵州民族地区人口的不断增长（1952年到1985年增加543.83万人，增长率为99.5%。1953年至1982年每

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黔南由61人上升为113人，黔东南由60人上升为107人，黔西南由67人上升为129人），以及其他行业用粮增多，粮食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如黔东南1957年人均粮食量为765斤，到1984年下降为556斤，只有1957年的72.68%。为解决粮食短缺的矛盾，贵州民族地区传统农业主要是通过毁林、毁草开荒，扩大耕地面积，以求得粮食总产量的增加。黔东南州仅1981年因乱砍滥伐、开荒毁林达3.86万亩。据黔南州农业区划资料，全州尚有应退耕还林还牧25度以上的耕地68万多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3.9%，其中35度以上坡地38万多亩，占应退耕地的59%。单一地以耕地为劳动对象的传统农业发展的结果，一幅暗淡的景象便在贵州民族地区出现了。

首先是生态环境恶化。由于毁林开荒种粮，森林覆盖率迅速下降，黔南州由解放初期的36%下降为1975年的16.2%和1984年的12.8%。黔西南州1957年到1979年下降3.16%，有林面积减少50万亩，森林蓄积量减少244万立方米。植被受破坏，又带来水土流失的加重。据黔南州水文站资料，1963年全州流走泥沙为1.13万吨，平均每平方公里为25.3吨，1980年增至13.8万吨，平均每平方公里为3090吨。该州在1984年水土保持会议上的资料表明，全州共有148个乡镇发生水土流失，面积达9350多万亩，分别占全州乡镇总数和面积总数的22.9%和23.8%。就是贵州民族地区植被相对较好的黔东南州，该州国土资源资料说明其水土流失亦比较严重，1982年全州水土流失面积为3200平方公里，占全州土地面积的10.5%。据对该自治州九县不完全统计，泥石流淹没淤损水库26座，总库容19877万方，山塘淤损334口，总蓄水量

492824万方，报废66口，干、支、渠淤积520公里。除此而外，生态环境恶化还表现为自然灾害的日益加剧。以黔南自治州为例，旱灾（水稻面积）：1957年为35万亩，1975年为73万亩，1985年达到102万亩；虫灾（水稻面积）：1957年为25万多亩，1975年为54万多亩，1985年为80万多亩，1986年达115万多亩；雹灾：1958年近3万亩，1963年为7万多亩，1976年为11万多亩，1986年达16万多亩。

其次是资源大量浪费。因为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的发展，不是从贵州民族地区山区的具体特点出发，违背了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从而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①自然资源的浪费。贵州民族地区的传统农业主要是追求粮食的产量，结果眼睛只看到耕地，而把占总面积75%的山地资源忽视了。据统计，1984年贵州民族地区有宜林荒地和草地4646.77万亩，占总面积40.01%。仅黔西南自治州1985年有宜牧宜林草坡荒山达1200多万亩，但存栏的60万头大牲畜大多是利用农区零星草山，连片草坡230多万亩，基本没有利用。又如黔南自治州，山菜、野果、野生纤维很多，这里的刺梨、猕猴桃、樱桃、杨梅等都适宜加工成罐头存放，但无设备加工而烂在山上。每年生产的盐渍山菜，没有利用到山上资源的万分之一。②劳动力资源的浪费。贵州民族地区以山地为主，适宜发展农、林、牧、药材、土特产等主体农业，同时还可发展以山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原料的加工业，这些行业如能兴起，便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因其传统农业是以种植业为主，就业门路狭窄，从而造成贵州民族地区大量劳动力资源的浪费。据调查，仅黔西南自治州1985年便有剩余劳动力35万人，占总劳动力的40%左右。